

# 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意识形态批判

徐 昕

**摘 要:** 因受到特定的阶级意志、政治制度、经济利益等因素的影响, 数字技术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具体表现为: 资产阶级利用人们在数字技术中所获得的自由、共享、便捷等情感体验, 在数字化生产中制造劳动解放幻象。他们试图塑造技术主义观念以增进数字劳动者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归属, 同时使后者在无意识中遭受数字资本的剥削与奴役。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意识形态实质在于为数字资本加剧对数字劳动者更加深入、广泛的剥削开辟道路, 进而强化资本对劳动全方位的统治权力, 也进一步激化了私有化与更充分的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唯有准确识别和科学把握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意识形态表现、实质、危害等基础性问题, 阐释其中所反映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与虚假性, 并最终落脚于现实的生产关系批判, 才能明确数字时代人类意识形态的重塑进路。

**关键词:** 数字技术; 数字劳动; 资本主义; 意识形态批判; 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 F038-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4)03-0010-10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40417.002

资产阶级总是不遗余力地操纵经济社会各环节, 用其自身关于自由、解放、法的观念等来衡量和操纵全社会的意志, 以服务于持续榨取剩余价值的需要。作为工业 4.0 时代的产物, 数字技术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智能化水平和生活便捷度, 同时也赋予资本家以更加温和、隐蔽的手段对劳动者进行精神驯化与观念控制的可能性条件。马克思指出, “工人们是被结合在一起的, 而不是他们彼此互相结合。这种劳动就其结合体来说, 服务于他人的意志和他人的智力……这种劳动就其物质的统一来说, 则从属于机器”<sup>[1] (P120)</sup>。数字技术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机器更广泛、深入的运用, 研究阐释其中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属性, 分析揭示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意识形态实质, 对于防范化解技术异化及其带来的社会危机与精神困局具有重要启迪。

## 一、数字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及资本主义应用的意识形态样态

无论是机器大工业时代还是信息化数字化时代,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应用的每一项技术都是由资本家安排的。资本家的意志和利益不仅影响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生产的各个环节, 而且渗透到政治、日常生活、学习、娱乐, 甚至思维方式, 以至于人们越来越按照数字资本的意识形态规定自身的存在状态。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 资产阶级文化“不再作为表达的象征或道德的意涵, 而是作为生活方式开始统治一切”<sup>[2] (P78)</sup>。

### (一) 数字技术缘何具有意识形态属性

工业革命以来, 蒸汽机等生产工具代替了人的体力劳动, 而“机器是大自然的仿制品, 是经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性研究”(22JDZ004)

**作者简介:** 徐昕,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102868@ruc.edu.cn (北京 100872)

过人的思维分析、调节、收缩、控制后的大自然”<sup>[3] (P47)</sup>。机器的运用会受到特定阶级、社会制度、规则秩序、认知方式的干扰。当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进了算法、程序设计、虚拟模式的运用，正在使生产劳动逐步走向智能化。数字技术并非具有纯粹的中立性，因为在现实的经济制度中时刻充斥着平台垄断、数据私有化、技术霸权，被资本权力所驾驭的数字技术因受制于统治阶级的政治理念与价值目标，服务于数字资本剥削剩余劳动的图谋，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社会技术的进步实则是一种“形式的堕落”。

在线平台和智能推荐技术的运用使劳动过程变得灵活、高效且有吸引力，更加符合人的本性。然而，构成数字技术的平台、算法在实际运行中受到资产阶级意志的规范和支配。资本主义在生产中使用它们的目的并非为了减轻或缩短劳动者每天的辛劳、给予他们一定的自由，而是通过数字劳动将人类全部生活纳入其增殖体系。随着社会知识和整个生产力的积累，数字技术便“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表现为资本的属性”<sup>[4] (P92-93)</sup>。其中，数字平台的设计、研发、操作等各个环节都是在资产阶级严密监视之下进行的，算法监督成为资本家控制工人思想意识的新手段，因为算法所特有的智能化特性易于获得工人的心理认同，这就更加便利了资本家按照其自身意图为工人塑造职业目标和晋升机制，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

数字技术成为资产阶级调和社会矛盾、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在机器大工业时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制造出一种“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的理论，即机器不仅排挤出雇佣工人，同时还游离出与这些雇佣工人的劳动力价值相等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将形成资本，去如数雇佣这些被排挤的工人，因此他们认为工人失业的痛苦只是暂时的，资本与工人迟早总要再度结合。这种调和阶级矛盾的论调实则是在为资本无限利用先进技术增加剩余劳动时间作辩护，旨在消磨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取消阶级斗争。而真相却是，这一过程是借助“工人的劳动受资本支配，资本吮工人的劳动”<sup>[1] (P354)</sup>实现的。一旦工人意识到自身的剥削，便会发起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也自然会想到如何利用生产中的技术发明更加有效地应对工人的反抗与斗争。因此，摧毁劳动反抗资本的“最后一点力量”便成为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重要动机。而通过影响数字劳动者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剥夺其离职的自由，迫使其不得不“自愿”接受机器的摆布，不失为一种更为巧妙的策略。为了把人置于全面的监视和控制系统制约之下，数字资本家总是鼓励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从事更多“创造性”的劳动，可即便如此，这种创造力也不是基于个人的成长发展，而是为了帮助资本家无限剥夺在线用户的闲暇时间、搜集身份信息和情感痕迹，从而迫使人们按照数字资本主义的利益和价值观而行动，更好地维护其对数字化生存的意识形态霸权统治。

## （二）资本主义数字化生产中的劳动解放幻象

当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进了信息网络技术的加速升级和融合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劳动力、资本、信息等要素的流动和共享，人类劳动因具有前所未有的灵活性而表现为“节约劳动”“自由劳动”。然而，“某种意义上人的思想、观念包括创造性思维、创造力及其创造观也会在技术存在物上有所体现”<sup>[5]</sup>。机器和智能技术已不再仅仅具有生产力属性，而是受到相应意识形态的规制，服务和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意志。比如资产阶级创造了众多自由、民主、开放、共享等带有欺骗性色彩的话语，来宣扬数字化生产所带来的劳动解放意义。但事实上，只要雇佣劳动制度存在，所谓技术带来的自由就并非劳动者的自由，而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sup>[6] (P757)</sup>。资产阶级所创造的数字乌托邦无非是通过为人们提供虚幻的精神寄托，来粉饰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应用持续不断地剥削数字劳动、压制真正的劳动自由的真实目的，并诱使人们在数字平台上释放更多数据，从而转化为资本家所占有的数据资源，获得数字剩余价值。

在资本主义社会，“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sup>[7] (P46)</sup>，资本主义使用技术的目的是使工人的劳动不断失去一切独立性和吸引力，也就永远无法摆脱数字资本的意识形态

态控制。在时刻充斥着“不安定和变动”的社会，每一个资本家唯有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强化关于生产能力的强制命令，才能生存下去。在数字技术的应用中，资本家一边借助算法把资本雇佣劳动力的自由称作“劳动自由”，另一边随心所欲地制定、修改和补充平台规则，迫使数字雇工比他们过去用简单粗笨的工具进行劳动的时间还要长，而这些时间主要是工人替别人劳动、唯独不属于自己的时间。这样，在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同工作日的延长就产生了悖论。除了为无限延长工作时间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之外，数字技术的使用还剥夺了工人离职和选择职业的自由。虽然零工经济创造了相对灵活的就业模式，但却是以工作的不稳定为代价的。例如人工智能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工人的智力劳动，其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导致分工无止境地增多，把更多的工人从工作岗位排挤出去，产生了大量过剩人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工人只需在这些机器上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表面上看确实获得了“解放”，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人们几乎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从一种职业转到另一种新的职业，彻底丧失了职业选择的自由和离职的自由，并且职业内部以及不同职业之间的工资差别非常大，从而形成不断深化的数字鸿沟和新的两极分化。

总之，资本主义只有不断利用数字技术为工人灌输“劳动解放”的观念，才能减少延长工作日的阻力。在日常生活中，自由、便捷、开放、共享的数字化体验背后却是大型平台公司长期占据垄断优势，诱发人们的平台依赖、算法崇拜、网络成瘾等新病症，以实现资本对在线用户的时间和注意力的无止境掠夺。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平台成为劳动者解放的技术基础，但因其受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的束缚，并不会实现真正的劳动解放，而只能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

### （三）数字拜物教与数字劳动中的技术主义观念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机器是主体，工人受机器的支配，只是被当作自动化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比起极完善的机器来，只能起着极不完善的机器的作用”<sup>[6] (P741)</sup>，即便个别工人还保留着部分技巧，但在科学、自然力和社会化劳动面前，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仅仅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技术主义的兴起，表现为盲目夸大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实则却是对劳动者在价值创造中主体性的弱化。不仅如此，人们无论是工作还是社交、消费、娱乐等，皆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参与，否则便会丧失基本的生存技能，被全社会所孤立。资本主义正是抓住数字技术的这种强大力量及由此形成的心理特点，通过制造无处不在的数字劳动形式，迫使人们总是在无意识中受到数字资本价值观的影响，进而在遭受深重的技术异化和劳动异化中彻底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

数字拜物教是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应用在观念中的反映，进一步强化了技术主义的影响力和扩张力。“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sup>[8] (P90)</sup>同理，在数字技术的运用中，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纳入平台体系，无论是资本家还是数字用户，都更加看重实物背后的数据价值，而数据价值的获得离不开数字技术。不论是生产过程的统计决策、商品推广，还是人们的就业、工作、购物、娱乐等皆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强大数据处理能力，这是平台资本获取数字剩余价值、强化竞争优势的关键。同时，在数字平台场域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多表现为数据关系，即以数据为中介的社会关系，由此，数据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力量，这一事实在人脑中的反映便形成了数字拜物教。

技术主义观念制造了劳动的社会精神与单个工人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不断改进生产工具，使得“专门化的工作机”代替了“人的有机体的工具”。在以往的手工业时期，劳动资料尚且把工人变成所有者，保持人对工具的支配，而进入大工业时代，机器的发明和使用极大地促进了工具对人的身体支配和观念统治。在资本主义工厂里，“工人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机器以灵魂”这一事实表现为机器本身就是能工巧匠，代替了工人的技能和力量，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在数字

技术时代，平台在算法机制的强力支撑下日益变得无所不能，通过对用户的身份、行为、情绪等个性化数据的收集，预测人们的消费习惯、购物偏好、潜在欲望等个性化特征。不仅人的技能被各种应用程序所取代，而且人的思想意识亦被各种各样的智能化技术所规训。从本质上讲，数据剩余价值来源于用户的无偿劳动，这种劳动具有产消合一的特征，是个体生命无限数据化、自身数据不断商品化、劳动成果进一步被资本化的过程。

技术主义观念颠倒了机器与工人劳动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机器是劳动工具的集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劳动的组合”<sup>[6] (P626)</sup>，工人的积聚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之一，也是生产资料赖以存在的基础。唯有使用大量工人，机器体系才能发生作用。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智能设备逐步取代人类的体力和智力而独立开展生产劳动，正在消解人们的主体性、个性和批判精神，因为“人类将他们自身的生命力——移动、体验劳动和思考的能力——输入到了他们制造的装置中。然后，他们体验到的这种生命力，就如同某种无关和疏离的、从别的地方返回自身的某种东西”<sup>[9] (P28)</sup>，这正是资本所希冀的，因为它便于对人类的思想世界进行深度掌控，甚至瓦解人们原有的信仰体系。而人类的批判精神则是作为意识否定性思考力量或者说理性批判力量，这种精神的丧失是现今资本主义社会“压制和调和对立面的物质过程在思想意识上的反映”<sup>[10] (P10-11)</sup>。

## 二、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意识形态实质批判

数字技术创造了更加隐秘的意识形态统治形式，帮助资本家粉饰无耻的剥削行径。因此，就本质来说，技术仅仅是服从于“使用者之意志的工具”。而人们一旦从这种虚幻的说辞回到现实社会，就会发现，机器的广泛使用往往伴随着工人生存状况的日益恶化，从而激化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

### （一）数字技术为资本创造了更加隐蔽的剥削手段

资产阶级总是把自身利益等同于整个社会的利益，并在全社会构筑了这样一种信念：“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也应该是好的”<sup>[11] (P197)</sup>。文明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粉饰或者否认它们，即实行“流俗的伪善”，声称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的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同样，资本主义在数字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并非对工人施以直接的强制力，而是通过“开放、共享、自由、个性”等话语和情景，试图掩饰数字资本的剥削真相，也正因此，数字资本主义得以进行更加广泛、深入且持续的“精巧剥削”，以最大限度地占有信息资源、攫取更多的数字剩余价值。

数字资本通过“玩劳动”的意识形态建构了对互联网产消者的剥削体系。用户在数字平台上浏览信息、在线聊天、发布动态等看似具有创造性、活跃性，难以觉察到剥削的存在。然而，“隐藏在乐趣相连和与其他用户相会的背后的剥削的现实”<sup>[12] (P243)</sup>。社交媒体平台总是以提升用户体验的名义将用户个人偏好的知情权私自授权给广告商，他们据此向用户推送个性化广告，这就导致了一种新的异化形式——作为数据的生产者，用户不仅无法控制自身生产的数据，而且在个人数据被商品化之后，成为平台资本利润的主要来源，用户自身却并未获得任何报酬。因此，数字资本的剥削行为是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一过程看似是用户自主自愿的，却恰恰也是资本施以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只有把握产消者行为背后的意识形态实质，才会明确资本与数字技术共谋对数字劳动者的剥削真相，并就此提出维护数字劳动者权益的可能性路径。

技术在生产中的使用总能激发资本吞噬活劳动的欲望，为了粉饰甚至美化这一过程，资本主义更多采用意识形态策略。西尼耳和托伦斯等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工资理论就是一个例证，他们认为用来生产工人所消费的商品的机器总是使工资提高，从而迫使工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心甘情愿地

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相比之下，平台资本的工资策略则更加具有意识形态性。在数字时代的雇佣关系中，谷歌、苹果、脸谱等平台公司创造了更加自由、灵活的工作形式，并建构了所谓“开放、合作和自我管理”相融合的工作文化，便于把工人自身的劳动吸附进平台体系，增进工人对数字资本的价值观认同。虽然数字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在同一劳动时间内，劳动力也将被更快地消耗，这一事实戳穿了资产阶级对数字剥削的掩饰。即便有时候资本家会给数字劳工支付一定的加班报酬，但这却是以工人被迫工作更长时间为代价的。长远来看，在平台经济模式下，劳动者缺少法律保障和人身权益保障。他们在工作中的灵活与自由是以资本生产关系及其意识形态的支配为前提的，随时准备在多种任务之间转换，从事超长时间的工作。我们使用的数字产品表面上光鲜亮丽的背后却充斥着数字劳工的无数血泪和汗水。

## （二）算法机制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权力

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智能化生产需要而形成的统治思想。算法机制为资本权力扩张提供了新手段，而资本逻辑为算法赋予了一种霸权向度，“算法即规则，而规则即统治”<sup>[13]</sup>，算法与资本合谋将资本对数字劳动和数据资源的占有合法化。

曾经在资本主义工厂里，手工技术和劳动经验为应用于机器生产中的科学技术所代替，工人只负担沉重而单调的体力劳动，“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sup>[8] (P487)</sup>。现如今，整个生产过程为资本家和程序员、贵族工程师等技术人员所操纵，工人跟着算法而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不自由的特性使其无法占有自己的身心”<sup>[14]</sup>，劳动过程对算法的依赖进一步加剧了智力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强化了资本对数字劳动的支配和占有权力。作为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日的一种形式，计件工作在算法的协助下，将“无限工作”的意念和追求植入到数字劳工的价值观念，增进他们对资本主义工作机制的认同，即为了赚取更多的工资、维持现有工作的稳定性，实现幸福生活的目标，而甘愿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甚至牺牲自身的闲暇时间来达成。因此，算法与技术共同将资本权力的控制形式推向更高阶段。

数字资本借助算法的强大智能算力强化对个体生命的监控，实现了生活殖民和对人的新型支配。“流量至上”的原则促使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更多吸引用户注意力的策略，而对流量的把握、对数据的追踪、对数字劳动者的监督皆有赖于算法机制发挥效用。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推荐程序似乎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的偏好、特征、计划。我们因玩游戏、浏览新闻、网上购物等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信息被这些数字平台利用算法机制建立了关联。这一过程往往不会直接作用于用户，而是通过影响其情感、观念、信仰等内在的精神世界，进而将其束缚于数字资本统治体系之中，人们身处其中却毫无察觉。在“赢者通吃”的网络效应下，大型平台往往更易于博取人们的信赖。人们在浏览、点击中所留下的痕迹被算法机制所捕获，从而通过个性化信息过滤的方式支配人们在线活动中的思想与心理，实则毫无个性可言。长此以往，人们所见到的信息局限于“自己喜欢的那部分”的推荐场域内，造成视野窄化、思想固化、价值同化，陷入认知茧房的生存困境。不仅如此，算法意识形态还将“监控社会”诠释得无以复加，通过“全景监狱”强化资本权力统治，这种监狱的存在并非与自由相对立，而是以自由为旗帜，体现为“人们自愿地将自己交付给全景注视。他们通过自我暴露和自我展示，主动为数字化全景监狱添砖加瓦”<sup>[15] (P85)</sup>。例如，生物识别技术虽然推进了现代社会的治理变革，但却也带来个人信息安全隐患，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诸多无形的数字和算法的控制线操纵着”<sup>[16]</sup>，个体生命变得无处遁形。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的开发与应用推进了知识生产范式的深刻革命，但这种知识生产模式却可能隐含着价值偏见、数字成瘾、知识产权侵犯等深层次意识形态风险。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却很容易对数字世界的虚幻景象不加批判地全盘吸收，愈来愈缺乏对事物的深度思考与反思，进而出于欲望而作出非理性的消费行为。

算法机制的应用更加便利了资产阶级文明的全球渗透，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所引起的一切破坏

现象反映到世界市场中并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意识形态是经济利益在观念上的集中反映，在世界历史的作用下，由科学技术所推动的生产方式的进步与世界市场的发展使其他一切民族必然遭受“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如“在脸书试图通过免费基础程序将互联网接入印度和其他国家时，圈地运动的形式更加严格”<sup>[17] (P123)</sup>，而资本家却“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sup>[6] (P757)</sup>。这也证明了，数字资本全球扩张进程中必定孕育着反抗资本权力的革命力量。

### （三）数据私有化加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对抗

“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sup>[18] (P557)</sup>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外在表现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数据要素具有公共属性，伴随智能技术的兴起，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由于人人都成为数据的创造主体，在客观上要求全社会共享数据资源，但数据所加工的果实却被少数大型平台公司占有，被当作生产资料转化为剩余价值。于是，贵族工程师、数字化部门的服务人员、知识工作者、互联网产消者等皆在无意识中成为数字资本的精神宰制物，与之相比，被数字资本边缘化的“流众”则处于更为悲惨的境地，成为更加彻底的数据无产者和新兴的革命力量。

数字化生产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关系的内在限度。数字时代出现的各种异化、剥削、失业、两极分化等现象，根源在于数据资源归大型平台资本家私人所有，本质是资本对数据的剥夺式占有。其一，用户是数据商品的创造者，却不占有数据商品，而是被社交媒体平台卖给了广告客户从而获得利润。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建构了一种新型的利润积累模式，开辟了掠夺全球数据资源和资本积累的新道路，并且在数据私有化政策的输出中制造了“资源富有的国家陷入极端贫穷落后的境地”的典型悖论。由此，数据资源越多，劳动者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亦越多，这必然会带来西方国家的数字资本同本国乃至全世界数据无产者之间的矛盾。其二，资本总是力图使数字基础设施不停地工作，即便是借助数字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也有赖于活劳动的参与，一旦与活劳动分离，数字化设备作为交换价值就会消失。同时为了应对因使用技术而造成的利润率下降，资本家只能无限延长工作日。为此，在数字生产中，他们利用意识形态策略来诱骗工人，把资本家的利益说成是维护工人的生存利益，从而“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sup>[1] (P69)</sup>。即便如此，也难免会受到工人的抵制，这是因为“资本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同资本要超越生产的任何界限的一般趋势相矛盾”<sup>[1] (P96)</sup>。其三，由于数字技术使生产变得更加容易，平台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引发深重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与大工业时代的情景相一致，每一次危机都把数字劳工置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同时也威胁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总是将技术应用所造成的工人贫困看似成为“合理的现象”，这与现实中无产阶级日益恶化的生存处境越来越不堪忍受的客观状况相矛盾。今天占美国总人口1%最富有阶层拥有全国21.4%的财富，总资产不低于60万美元的美国人增加到410万人，美国最富有的1/5和最贫困的1/5家庭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无论是机器还是数字技术，资本家运用它们的都是为了同活劳动的要求直接对抗，从而资本“表现为同单个工人相对立的工人共同劳动的社会力和形式的化身”<sup>[1] (P354)</sup>。在数字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地方，数字资本一方面将更多的工人排挤出去而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口，另一方面又不断吸收工人，因为剩余价值只有靠增加雇佣人数的办法才能提高。这种吸收和排斥导致工人生活的经常波动，因而进一步印证了数字技术这一“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sup>[1] (P538)</sup>。

## 三、对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意识形态重塑进路

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劳动方式、组织形态、消费方式，

有人据此以“数字资本主义”指代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阶段变化。在这一时期，空前提高的生产社会化水平与数据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故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非但没有缓和，反而呈现出激烈的态势。只有与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彻底的决裂、建立联合起来的人共同占有数据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才能使人类完全摆脱技术异化以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所带来的种种灾难，并从根本上改善人们的生活、真正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 （一）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实现数字技术健康发展的根本出路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数字技术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如数字异化、网络成瘾、失业危机等，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顽疾和弊病，在于资本驾驭了科技。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统治的合理性以维护这样一个[社会]系统为标准，这个系统允许把同科技进步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的提高作为它的合法性的基础……个人被迫所承受的那些牺牲和负担，愈来愈表现为没有必要和不合时宜”<sup>[19] (P40)</sup>。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合理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生产关系对社会的驾驭。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对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并非反对数字技术本身，而是要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是社会公平的顽疾，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根本障碍。因此，意识形态批判要落脚于数字资本主义“物质利益”层面，即进行生产关系批判，才会从实质上扭转这些负面效应、改变工人的生存状况。

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更加充分地证明：生产力每前进一步，都会受到资本主义私有制更加严重的束缚。数字技术的运用赋予资本以巨大的扩张力，而市场的扩张却赶不上生产的扩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愈益激烈的冲突，引发更为普遍性的经济危机。事实证明，为了缓解危机和维持资本社会的正常运转，资产阶级善于采用数字技术推出巧妙的营销策略、寻求新市场的办法，却从未获得过根本性的成果，而且越是危机临近的时候，资产阶级越是兜售“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的意识形态谎言，逼迫工人付出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为资本续命，造成新的恶性循环。因此只有变革生产关系、撼动资本主义制度根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把资本主义工厂的“温 and 地狱”变成社会主义的企业，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彻底解放被资本意识形态束缚的科技生产力，使数字技术的运用真正贯彻“以人为本”理念，而不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

总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愈益成为工业生产力和科学、艺术发展的障碍。因此数字时代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的唯一出路在于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破除数字拜物教所产生的现实基础。数字技术的自身发展使建立一个“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所有人的需要来领导”<sup>[6] (P683)</sup>的社会组织成为必要，而“一切解放都有赖于对奴役状态的觉悟”<sup>[10] (P7)</sup>，这种觉悟的标志就是通过社会革命从根本上把社会生产力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把真正的生产者、广大人民群众从数字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而宣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终结。

#### （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指引数字劳动者实现自身解放和构建新型世界数字秩序的思想武器

彻底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数字生产力，必须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世界的科学指导下将数字技术转化为劳动者和全人类走向解放的思想武器，实现对束缚数字技术健康发展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真正超越，开创人类数字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是指引全世界数字劳动者打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与奴役的科学理论。马克思认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sup>[6] (P17)</sup>。无产阶级革命性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工人从自发走向自觉，关键在于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他们将时刻不忘教育工人明确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以便工人群众能够利用机器的资本主义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政治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现如今，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不仅在更大范围上把各国各民族都纳入资本主义剥削体系，同时也通过将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西方价值观渗透于生产、生活、消费等各领域，进而把从数字雇工到数

字用户，乃至全世界的数字劳动者皆变成西方数字资本的意识形态统治对象。推动变革、走向解放有赖于新型意识形态的引领，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问题也是我们党“坚定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sup>[20] (P16)</sup>。当下运用数字技术破解劳动异化困局、冲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牢笼和防范数字时代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风险皆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唯一路径。即便数字时代发生了诸多巨变，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原则性论断依然有效。社会发展要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社会，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共同控制社会生产，社会生产摆脱了无序状态，“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sup>[8] (P96)</sup>。数字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运用不再是为了满足资本增殖和扩张的贪欲，而是无条件地服务于人的需要和发展，并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只有到那时，人们才彻底摆脱了精神异化危机，重新获得了主体性、创造性，为实现个人自由和集体自由、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真正统一奠定基础。

当下数字领域出现的发展失衡、道德困境、虚假信息泛滥等诸种乱象，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数字技术的人为运用不当，这背后隐含的是资本逻辑所主导的价值观以意识形态划线或构建排他性集团、利用技术垄断和单边强制措施制造发展壁垒，等等。而在共产主义世界观指导下，中国积极倡导加强数字安全国际合作，并提出数字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在实践中始终坚持以多边主义原则为核心构建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持续打造“更加公平合理、开放包容、安全稳定、富有生机活力的网络空间”<sup>[21]</sup>，正在为形成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数字秩序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 （三）新时代中国对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意识形态重塑

思想领域往往是瓦解一个政权的突破口，一旦思想防线被攻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因而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关键要看能不能占领网上阵地，能不能赢得网上主导权”<sup>[22] (P55)</sup>。我们既要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同时又要做好数字平台的内容建设与秩序治理工作，确保对数字技术的运用和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无产阶级要想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与精神压迫，关键是要建立自身强大的意识形态体系。“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sup>[23] (P327)</sup> 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为传播手段创新提供了重要契机，催生了微博、微信、网络电视等新媒体，推动党的声音直接进入各类用户终端，为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要继续通过加强数字技术赋能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利用数字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积极回应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攻击，“以内容优势和传播优势推动形成网上正面舆论强势”<sup>[24] (P47)</sup>，牢牢掌握数字空间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加强公民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对风险信息的自觉识别与防范能力。在数字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从普通民众的思想世界中寻找突破口，通过数字平台大规模传播和渗透价值观，并制造舆论声势，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肆意造谣生事，达到扰乱人心和策动颜色革命的政治目的。警惕西方利用数字技术对我国舆论生态的侵蚀，对民众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增强舆论受众的媒介认知能力、价值判断能力、信息筛选能力，就成为提升人们媒介素养的重要方面”<sup>[25]</sup>。对此，国家、社会和学校需要协同配合，扩大媒介使用群体，消弭代际间的数字鸿沟，并积极探索建立媒介素养教育常态化机制，引导公众加强对媒介内容的理性思考，增强对算法监控体系的警觉和保护隐私意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技术应用导向，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对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意识形态批判不仅要廓清其价值立场，而且要回到我国对数字技术的现实运用过程。

如今,共享经济、网络零售、移动支付等新业态新模式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把提升包容性置于更突出位置,处理好公平和效率、资本和劳动、技术和就业的关系,重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sup>[22] (P22)</sup>。在此基础上建构符合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方面要加快信息化数字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是加剧数字鸿沟和造成新的两极分化的根源。而我们对信息网络的运用更多致力于消除不同收入人群、不同地区间的数字鸿沟,通过“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深度开发各类便民应用,推动优质资源全民共享。另一方面,还需加快建立规范数字资本运行的基础制度。数字化企业如果不加以规范和引导,极易被资本逻辑影响和驾驭,为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植入大开方便之门。因而要引导它们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规范,避免一味追求点击率、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和成为谣言扩散器。

#### 四、结 语

技术的运用本来是节约劳动、解放劳动者的手段,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成为剥削数字劳动的工具。因此数字技术的应用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成为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是一个关乎意识形态的重要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托数字技术变革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性契机,“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sup>[6] (P552)</sup>,并且将整个世界纳入其意识形态控制系统。与机器大工业时代雇佣工人受到深重剥削不同,在数字时代,所有人都被纳入全球数字生态剥削体系。为了使这一过程顺利推进,资本家在人们内心深处塑造了这样一个幻象——劳动者所拥有的一切皆来自数字技术的恩赐,并使其“心安理得”地接受资本的意识形态改造。从表面上看,这种意识形态手段的确塑造了数字劳动者和数字资本主义“趋于一致”的价值观,实质则是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以更加激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因为资本是社会劳动的存在,却同劳动的现实要素相对立,所以“资本的关系本身就像雇佣劳动的关系一样,是完全矛盾的关系”<sup>[1] (P121)</sup>。由于数字技术表现为资本的存在方式,为了剥削和奴役数字劳动者,资本家将自身意志融入了数字技术的应用过程,不断影响劳动者的观念、价值观与行动,从而工人阶级日益恶化的生存处境酝酿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综上所述,数字技术并非劳动剥削与异化的原罪,要害在于资本主义应用。寻求劳动解放、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唯一现实的出路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革命,从根本上撼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基础,实现数字技术应用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 [3] [美]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M].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5] 刘建华.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属性与风险及其应对[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美]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M].杨海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10][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周延云,闫秀荣.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数字化时代国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13]邓伯军.人工智能的算法权力及其意识形态批判[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5).
- [14][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奴隶制与种族主义[J].王珍,译.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0(9).
- [15][德]韩炳哲.透明社会[M].吴琼,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 [16]蓝江.智能时代的数字-生命政治[J].江海学刊,2020(1).
- [17][加]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M].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 [1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9][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2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1]习近平向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N].人民日报,2022-11-10(01).
- [2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2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4]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5]李江静.数字帝国主义算法控制下的意识形态风险及防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7).

## Ideological Criticism of Capitalist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XU Xin

**Abstrac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specific class will, political system, economic interests and other factors, digital technology has distinct ideological attributes. The bourgeoisie uses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freedom, sharing and convenience obtained by people in digital technology to create the illusion of labor liberation in digital production. They try to shape the concept of technicalism to enhance the psychological identity and emotional belonging of digital workers, while making the latter unconsciously subject to the exploitation and enslavement of digital capital. The ideological essence of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capitalism is to open up the way for digital capital to intensify the deeper and wider exploitation of digital workers, thus strengthening the all-dimensional ruling power of capital over labor, and further intensify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ivatization and more fully socialized mass production. The only way to clarify the path of reshaping human ideology in the digital age is to accurately identify and grasp the basic issues such as the ideological expression, essence and harm of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capitalism, explain the class and falsehood of the ideology reflected in it, and ultimately settle on the critique of real production relations.

**Key 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labor; capitalism; ideological criticism; communism

(责任编辑 孙洁)